

※余國藩教授榮退專輯※

## 跋語：翻譯的行動和藝術 ——論余國藩教授在西方學術界的宗教和文學志業

羅森加登\* 著 謝惠英\*\* 譯

翻譯是揭開了窗，接納了光；是敲破了殼，才可能吃到果；是將簾幕推靠兩邊，我們才得以一窺至聖之地；是移動井蓋，我們才能取得水。

——〈譯者致讀者書〉（“The Translators to the Reader”）（欽定本《聖經》，1611年）  
那是一首好詩，波普先生，但是你不可以說它是荷馬的詩。

——理查·班特列 (Richard Bently)

一段翻譯可能在某個時間點完成，但它從未結束……

——余國藩

本文旨在討論余國藩教授由西方文學傳統發展而出的傑出的文學批評著作，尤想強調他和西方學術理論圈的往來互動，以及此類互動為宗教和文學衍生的意涵。本文重點有三：其一，在文學理論上提供余教授學術背景的文本批評發展過程，而對應余教授自身的學術寫作而言，這也是一種對位式的遁走曲；其二，余教授在芝加哥大學時的名師史考特 (Nathan Scott) 對他的影響，尤其要考察史考特在宗教和文學領域的課程當中，余教授所習得的自我反思式的詮釋；其三，在余教授的學術生涯中，任何學術意圖、學術創見無不藉由比較手法發軔行動，所以「比較」無疑是余教授一以貫之的學術方法。

首先我要說明，如果我從「比較」出發的角度來閱讀余教授著作的方向無誤，我們有待透過此等東西分野的思考，才能達成理解和欣賞余教授著作的終極目標；

---

\* 羅森加登 (Richard A. Rosengarten)，芝加哥大學神學院教授。

\*\* 謝惠英，專業譯者。

或者至少可以特定的方式召喚，使之既能闡明余教授著作流暢明快的實存表相，也能詮釋其份量不輕的背後真理。我更要提出建言：我在這方面自有準則，亦即在思索闡揚余教授循西方傳統建構而成的學術著作之際，我們宜與之並置而觀的是余教授最常與之互為聯想，並循東方傳統化育而出的成就，也就是他身為翻譯家所成就的藝術。

## 一、背景：批評均勢的挑戰

余國藩教授的批評志業發軔於一九六八年，此後賡續前行，不懈不怠，以迄於今。我們也深信，來日他亦將如是。就多元主義的挑戰與詮釋之為用而言，於此尤稱切題的是敘明文學理論的背景範疇。此一範疇框括了一段時期，余教授正是在此一時期內提筆縱橫四方，大展身手。這個時期我們知之甚稔，然而就這個例子而言，我或可借用大師的話：知之甚稔乃比重提更值得重視。

在西方，一九六八年當然不僅是個政治的支點。新批評不管於理論上如何「氣數已盡」，主要在美國又以變異的風貌在歐洲各地繼續維持其身價與地位，強勢主導各大學英文系的文學分析與教學模式。就在這個時刻，德希達的首批主要著作《文字科學論》(*Of Grammatology*)及後來輯入《寫作和差異》(*Writing and Difference*)一書的多篇論文逐漸嶄露頭角。證諸事後諸葛，這兩波運動有其遇合之處，亦有其扞格走調之處。儘管如此，絕對無庸置疑的是，破壞的意識，或至少是崩解現狀的意識，正是解構工程氣勢奪人的萌動經驗。這點在許多批評大將的批評觀點發展上痕跡確鑿。舉例言之，像米勒(J. Hillis Miller)論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的著作《上帝的消失》(*The Disappearance of God*)一書，對研究宗教和文學的學者而言，就堪稱是舉足輕重之作。其精華滋蔓，而踵繼其後者係一連串的論文和書籍，徵引解構的行為人人遵從。他們析論解構主義的種種意涵，作為文學研究的議題來用。再來尤其是費雪(Stanley Fish)一人，假《為罪所驚》(*Surprised by Sin*)一書抽絲剝繭細讀米爾頓。此書之後，費雪的論述稍顯轉變，接下所論，乃宗派意義的建構，大多收錄於《這堂課上是否有文本？》(*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一書之中。

如果說解構思潮撼動了新批評主義的現況，隨後的諸般發展只有使得這場震撼更為盪漾擴散，女性主義的文學批評揭橥了重讀文本的閱讀準則，而性別研究繼之而起，方興未艾，將一種曖昧游移的氛圍導入文學分析，身姿絕妙深深潛藏於新批

評主義潛意識最沉最遠的蹊徑深處。階級和種族的議題又為這種突然湧現的批評感知完成四方結義的大業。此一大業拋出決定性的議題，質疑古來古典西方「偉大文本」的準則走向，在合法化競逐權力和一統四方之間著力，在反壓迫者和反非我族類上作為，結果並非無心插柳地孕生其互補式的能量，而是形塑了藝術靈感和藝術作品中虛假的原始或隱士觀點。

新歷史主義的後期發展多少和這些發展互為連動，結果卻滋蔓為對它們的複雜反動。新歷史主義的後期發展寄寓於回歸文學作品的歷史場域，然而其作法卻是借道我們或可如此稱之的「微形歷史」(micro-history)：這個場域曖昧幽微，卻是絕對揭露無隱的事件或現象，學者可從其中發展出周延的闡釋攻勢。

總而言之，余教授的批評志業正是成就於百家爭鳴，眾議揚沸的批評史上的一個大開大闢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多元並置的手法示現於多數詮釋者的眼前，卻又完全琴瑟和鳴於它們的基本假設。在此情境下，如何能夠維持批評的腳步，使之免於跌躓，如何就詮釋研究的目標和手法抱持均衡觀點，就是主要的挑戰。下文我會提出余國藩論述西方文學的成就的金字招牌在與時俱進、持續呼應諸方批評理論下的發展，而其回應媒介一向是有所本、有所依循的比較文學家的觀點，既能吸收嶄新的外緣 (extrinsic) 和內涵 (intrinsic) 手法以為闡釋之道，同時又肯定文本的核心價值。我也要指出，這種手法有其潛力，足堪勝任舉足輕重的基礎任務，立論有所本的比較文學者正是立足於回應多元主義的挑戰之上。

## 二、重探明師：史考特的神學資產

更發人深省的是，在這個大環境下，余國藩的美國知識導師史考特為田立克式的基督教神學家，他在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發展出先是名為「神學和文學」、後來又稱之為「宗教和文學」的學術領域。如同余教授在題獻給史考特的著作中溯源感恩、條分理析的介紹文中所形容者，史考特的批評立論並無感於縱身延觸「西方基督教傳統外的宗教文本和理念」。不僅如此，史考特的批評感知堅決指出現代西方經典的里程碑才值得研究。事實上，就某種意義而言，我們若果參照上面論及的優勢批評論述，則可謂史考特一向是個「流行圈外的人」。他不是新批評主義者，即使他顯而外露的神學旨趣創造出一套批評語彙，其間作者的原創意圖和讀者的互動反應都是猗猗盛歎。他晚出的著作挪用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的作品，擷取的

方式反應出與解構主義之間的鴻溝，而非弭兵和解。

如是觀之，史考特的批評典範似乎反應出一種孤絕嶮巇、棄絕較為寬廣的批評論述。然而，如同余教授所指陳者，這事實上乃是一種功能，彰顯出史考特意欲連結發展出一套文化的神學分析理論。史考特的挪用引據田立克的文化神學，筆端所析論者乃批評交互關係的本質，視之能突顯出文化宗教本質中的隱性質素。對史考特而言，援引田立克立論的旨趣是雙重的：第一，它乃是總論式的訴求，其間所為，我們認為是宗教形構了文化的本質；第二，它揭櫫了神學架構的門檻，目標是文化類型的洋洋大觀，含括的非僅是經書、歷史和教義，而且是實質的文化藝術。

由此我們可以瞧見余國藩批評立論平衡感知的種子為何，然而最值得注意者乃余國藩自身對田立克神學志業的進一步論評。余國藩踢進了臨門一腳，認為史考特護持的田立克觀點和田立克的同僚愛里亞德 (Mircea Eliade) 的觀點有其密切輻輳之處。余國藩認為，二者皆擷取余教授所謂的先驗法門，將宗教本質視為神聖的示現。用余教授的微言妙語來說，接續的則是「田立克和愛里亞德認知中的宗教，而這種宗教無疑殆屬本質主義者的宗教，是實存具相的存在，也是天賦神授、宇宙普世的現象，而且具有時空各異的多元展現」。就愛里亞德的術語而論，愛氏式的神學闡釋和田立克意涵中的終極關懷率都是聖者的構詞學。

可是，就余教授的翻譯詮釋而言，史考特的志業變成了構詞學的一種，非屬聖界，而是屬於信仰；非屬於本質主義者的模式，而是屬於負傷懷憂，將信仰盟誓賦予一個世界的模式；借用史考特的語彙來說，此等世界沒有神祇，十足世俗，他自招自認是非屬宗教的。這種盟誓交付，比重等同地引據柏納霍夫 (Bonhoeffer) 的感知，亦汲取田立克的感知，而正是這種盟誓突顯具現了余教授的史考特立論，促使文學藝術超越文化診析，也超越田立克思想中或許刻意暗藏的偏見漫畫。漫畫中提問的角色是世界，而基督福音為之作答。因此，它是「藝術家」信仰的構詞學，是創造衝動的構詞學，對史考特的觸動感發更勝於語言的藝術本身。在余教授精巧的詮釋中，我們因之能審知史考特和新批評的距離，知道他招認和新批評無緣，認為詩的主要語言完全是自我反射的符號體系。而史考特的思賦也因余教授而彰顯，將隱微事物選譯成堂而皇之的宗教示現：這是現實的神聖視景，逸離超自然主義的包袱。此處亦寓居其根源，足堪解釋何以史考特著迷於海德格式的前提，認為存在 (Being) 就是允許和敦促事物現身。

依我之見，在本質上，余國藩的學術似乎特別受惠於著力研讀史考特之著作。

研究宗教和文學的學生當然有必要自思自付，拿捏輕重，評估此等閱讀為解經注書，或是在史考特的立論上跨前一步。雖然如此，有三點於我亦堪稱重要：其一，此處有一萌動，起步邁向宗教用語型類有本有源的多元主義，神學批評家理應獻身於此。討論可以無所不括，無不可容。其二則循其一，典範的生成因之是種關鍵作為，就某種重要意涵而言，其內在本質是比較式的。批評家面對可摭拾擷取的素材，理當有所抉擇，而抉擇牽涉評估，評估的本質即是比較性的，具有賞析的特質。其三，愛里亞德引領風騷的宗教歷史和田力克據以代言的神學皆乏比較作品的空間；實際上，他們命題立論的出發點極端相似，是先驗的、本質主義者的宗教範例。對神學志業而言，比較式的作為誠屬必須，如同比較對宗教歷史學家的志業亦不可或缺。在西方母模中，至少觀諸余國藩所演繹者，比較係核心的事業。我們就從這裏轉而論述余國藩的比較實踐。

### 三、比 較

余國藩教授在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探討墮落的概念：《墮落——伊斯奇勒士、米爾頓和卡繆的詩學及神學實在論》(*The Fall—Poetic and Theological Realism in Aeschylus, Milton and Camus*)。這篇論文宣稱他的著作特以比較手法論述西方文學傳統。論文據以組織的修辭比喻是基督宗教神學式的，但是它隨即轉向，瞬即氣勢千鈞地帶入與希臘悲劇和法國存在主義的追尋對話。這種結果縮聚在一連串煜煜生輝的文章中，提供了此等基督教修辭一個掌控全局的知性優勢，然卻同時也挑戰、折衷、仲裁此等優勢。（縱觀余教授的著作，他始終堅信基督宗教神學的強韌力量，對照而出且相映成趣的是，至少對讀者的心靈而言，相對較為流行的神學作品中的這些觀念，卻是相對照之下較易變遷的態度。）密爾頓「快樂的錯誤」(*felix culpa*) 觀已然被代替成詮釋《失樂園》(*Paradise Lost*) 的關鍵，而創世紀第一章第二十七節則成為必然的已知數。結果是完全重構夏娃在墮落行為中的角色，此等詮釋將她解釋為非誘惑者，而是亞當認罪懺悔的促成者。當余教授追溯巴斯 (Karl Barth) 的墮落論及密爾頓的墮落觀，驚詫於其間的平行並比之外，亦未忽視其扞格之處，而其中之犖犖大者，乃夏娃對配偶之慷慨大度遠遠凌駕先為之救贖恩典，而如此只能歸因於「人性深處的神祕」。在討論卡繆時，神學反思主義 (theological revisionism) 亦發揮作用，《墮落》(*La chute*) 被視為提供了一強而有力的對比敘

述，對應田立克式所謂激進的懷疑即是信仰的觀念。他如是言：「卡繆想像宇宙中的激進懷疑不必然暗示信仰：對克拉蒙斯 (Clarence) 來說，只有深沉的失望。」

類似地蓄意經營的比較模式，鼓勵了余國藩邁步探索《聖經詮釋學》的歷史。在此我或可引用他深入閱讀傅雷 (Hans Frei) 的《聖經敘述學之蝕落》(*The Eclipse of Biblical Narrative*) 的語句，「重新發現故事的意味」。余教授有此語，緣於他深深感佩傅雷詳盡精準、刨根究柢的歷史基礎功力；然而，余教授也注意到巴斯的神學觀點無能統一整合所有相關的資料，以使用現代語彙、現代風格來討論故事的命運。傅雷的論點是：故事的意識殘存於英國，緣於小說的崛起；故事的意識失落於德國，因為此地歷史批評的手法凌駕一切。余國藩檢視這點，手法是將鄧約翰 (John Donne) 預示論化的講道訓詞和約翰笙博士 (Samuel Johnson) 的寫實主義妥為並置。余教授寫道：「或有人懷疑，是否約翰笙博士會同意用『寫實』一詞來形容下面一段敘述：敘述中的主角在水面上行走，從死者當中起身！」余教授在此賞析西方解經學上的一篇傑出論文，但他有一先決條件，亦即是作者失於體認司萊馬赫 (Schleiermacher) 認為詮釋領域誠然必須完全開放的說法。

#### 四、翻 譯

余國藩也提筆寫些重要的標題式論文，主題遍及宗教和文學的領域、比較研究和翻譯。我的時間和篇幅皆不容我遍覽這些著作，但是這裏重要的是要強調三個普遍的主題，以便驗證翻譯於余教授自身，乃比較學者研究手法的重要性。

首先，就如同他為芝大神學院期刊《標準》(*Criterion*) 就「宗教和文學」而寫的一篇論文所言，「宗教和文學」為一研究領域，其存在和其他「相關的研究常模」，如文學和歷史般，並不具備更多理所當然的緣由。這種論點強調方法學和理論上之自我省思乃關鍵所在，任何學術研究皆應知悉這一點，這點於宗教學術尤關緊要。在此我們姑且回想余國藩精心琢磨史考特的著作，突顯田立克和愛里亞德間不為人知的彌合處。

如果概念空間中並無詮釋存在，同樣地，闡釋的作為皆會千方百計將自身合理化，初始是本文研究，語音學研究和歷史研究所衍生的攀親帶故關係，然而這會迅即煽風播火，而擁抱在身的不只是形式主義者或語意分析，也是完全自外於研究資料的技巧和原則的應用。既有的典範誠然值得尊敬，然而不能用來消抹詮釋的選

項。因此，余著迷於崇仰進退有據的原則，派里 (Milman Parry) 即據此完成他論述荷馬式史詩的劃時代著作。

派里的例子深具啟發性，余教授的分析，一者在辯護派里避免任何不當觸動的指控，二者又仔細敘明他之分析荷馬式史詩研究的局限與力道。正是這種文本至上的態度，以及詮釋者在文本傳輸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最後形塑了余國藩批評立論的主導力量。誠然，無人較他知之更明，詮釋 (*hermeneia*) 一字含括者不只是闡釋，而且也是翻譯。清楚的是，余國藩在西方古典文本的論述中，其核心皆保有一貫意識，認為詮釋和翻譯這兩個語彙實為互補，而非爭鋒。

在此種互補中，依我之見，寓存余教授的論述功力，持守一進退有據的空間，以受納理論爭鳴的繁花盛景，而此花繁華麗正是提供他學術著作的背景。在此同時，又要持恆守志，深思熟慮，獻身於東西方文學傳統的比較模式研究。翻譯強調讀者之於文本的關係，突顯的是文本自身的原貌，更是在作品選譯傳輸中，譯者勢必有所更動的事實。寓居於翻譯中的是權力，或許是榮耀。然而無可避免的是，至少有部分的偏頗扭曲，譯者因之和詮釋藝術的力道和局限親密互動，而且能將認知及自制矜守搭配得宜，欣然接受理論論述的蹣跚和逆旅。既能體認其重要性和不可或缺，卻也不能或忘其價值所在乃精準明確，藉之方能體認詮釋是一個傳輸形式，是屬於其自身的翻譯模式。欽定本《聖經》的編譯諸家甚至知悉這其中牽涉的極大可能性，而一個半世紀之後，班特列 (Richard Bentley) 更強調其中所布的陷阱。余國藩的學術著作全然擁抱，也明確誦揚翻譯在詮釋性工作中的地位，並在此過程中條貫分明地析繪出，就我們在宗教和文學上的研究而言，多元主義對詮釋大業的挑戰。這個挑戰淵源久遠，更加值得我尊敬，而且這種尊敬是完全必要的。